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泰州学派研究

Taizhouxuepai
Yanjiu

吴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泰州学派研究

Taizhouxuepai
Yanji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泰州学派研究/吴震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阳明学研究丛书/吴光主编)
ISBN 978-7-300-11339-5

I. 泰…
II. 吴…
III. 泰州学派-研究
IV. B248.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190 号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泰州学派研究
吴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9.2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9 000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暨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并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出版资助，特致谢忱！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一

刘述先*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入）、南中（指江苏，《泰州学案》括入）、楚中、北方、粤闽。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竟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泰州派的问题更大。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儒学案》的背景。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

* 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学士、哲学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讲师、副教授，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1974—198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81—1999），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讲座教授（1999—2004）。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等职。著作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等20余种，并有英文论文60余篇及著作多种。

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评价不高。王门在北方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乃可以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来看吴光教授策划与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其内容包括专著十部，论文集一部。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①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套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专著十部，首先是董平著《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从对阳明生平的阐述中，展示阳明生活世界的变化与思想世界的演进。接着钱明著《浙中王学研究》，徐儒宗著《江右王学通论》，吴震著《泰州学派研究》，对王门的三个重要流派作出了深入的省察。然后是何俊、尹晓宁合著的《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由此可以看到梨洲虽对蕺山之学大行于世抱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事与愿违。到了清初，发生典范的转移，梨洲成为心学的殿军，不期而然促成了“达情遂欲”、“力行实学”、“文献考据”的转向。吴光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探讨了梨洲的学术成就，从而肯定了他之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然而丛书并不局限于儒家的视域。朱晓鹏著《王阳明与道家道教》，陈永革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爬梳了史料，揭示了阳明学与道家道教以及晚明佛教（包括“狂禅”）的关系。同时阳明学又不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现代意义。刘宗贤、蔡德贵合著的《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具体探讨了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现代新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思想特质及其与阳明学的思想联系。丛书还包括了韩国学者崔在穆著《东亚阳明学》的中译本，展示了一个跨国界的开阔视野。最后《阳明学综论》收录了当代多位著

^① 自1981年至今，浙江学界举办过多次关于叶适、陈亮、吕祖谦、刘基、王阳明、黄宗羲等宋明理学家以及浙东学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举办了“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省一级学会“浙江省儒学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和《儒学天地》杂志以及《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继往开来论儒学》等专题论文集，还有多部儒学论著，从而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肯评。

名阳明学专家所撰稿，并汇集参与本系列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论文，编为论文集，希望能在阳明学研究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2009年6月10日序于台北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二

吴光

1984 年至 1991 年间，我有幸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负责组织策划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多种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本来还计划组织一套“浙学资料汇编”和一套“浙学研究丛书”，但由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干扰了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致使当时的我在离职感言中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但到 2000 年前后，形势变化，我再次被委任为本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继而担任主任。于是，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董平先生共同策划、分工合作，由他负责主持“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的课题^①，由我负责主持“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后来，由我主持的课题先后得到浙江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成为浙江省 2001 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 2002 年度规划课题。我们的课题组 12 名成员经过 7 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套包括 9 部专著、1 部译著、1 部论文集，总计 11 册约 300 万字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丛书完成后，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提供了出版补贴；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① 本课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立项成为本院 2000 年度重大课题并提供出版资助，最终完成了一套由万斌任主编，钱明、董平任副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10 册），由凤凰出版集团于 2007 年出版。

予以出版，使著者、编者的辛勤劳动得偿所愿，也可谓学术之幸也。

以往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对王阳明本人及王阳明学说本身的解说，而缺乏对阳明后学各派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既没有组织集体力量进行系列性的大课题研究，更没有出版过系统梳理和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学术思想的系列丛书。然而，深入研究王阳明与阳明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宗旨、学说特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深入研究阳明学与道教、佛教以及明清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当代儒学、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之间的思想联系，深入研究阳明学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关系诸问题，不仅对于系统整理中国哲学遗产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多元和谐的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设计本课题的初衷，一是要自觉担负起作为阳明学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的浙江学者的历史使命，对阳明学的发展演变作出系统性的思想史的总结，向国内外读者奉献我们系统探索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与角度揭示阳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代意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多元和谐新文化而贡献我们的知识与心力。本丛书的各项具体成果，基本上实现了这一初衷。

本丛书研究的主要思想是：第一，通过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及其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目标、“知行合一”为方法的学说思想的综合研究和客观评价，力求使当代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王阳明的学术贡献，正确认识王阳明学说的理论内容、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第二，通过对阳明学内部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具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理清阳明学形成、发展、分化、演变乃至衰落、复兴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三，通过对王阳明以后的明清以至当代儒学与阳明学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特点与规律，进而探索阳明学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意义；第四，通过对阳明学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不同命运、不同历史作用的比较研究，探索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借鉴。

本丛书的特色在于，它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各个思想家思想学术的个案分析与阳明学各学派和宋明以来心学思潮研究相结合的系列研究课题。其内容体现在各位课题参与者撰写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本丛书的选题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人物大传，主要是论述阳明学派三大儒（创教者王阳明、修正者刘宗周、转型者黄宗羲）的生平事功与学说思想，附论其所创立的学派（姚江学派、蕺山学派、浙东学派）之概况与特色；二是专题研究，本丛书选择了阳明后学三大派（泰州王学、江右王学、浙中王学）以及王阳明与道家道教、晚明佛教、当代新儒学三专题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究；三是比较研究，既有阳明学内部诸学派的比较研究，也有阳明学与明清佛学、道家道教以及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成果，大致展现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思想内涵与学派特色，展现了阳明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对中外儒学思想史的重大影响。

我相信，读者从本丛书各部著作与专题论文中，可以看到作者艰辛劳动的收获，可以分享作者闪烁智慧之光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获得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此言虚乎？实乎？还是敬请读者深入丛书内部一探究竟吧！

2009年7月25日识于朝晖力行斋

目 录

绪 论 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	1
引言	1
一 泰州学案之设定	3
二 赵贞吉与泰州学派	10
三 耿定向与泰州学派	16
四 李贽与泰州学派	30
五 结语	38
第1章 王艮：泰州学的创立	42
第一节 家世与生平	42
第二节 现成良知	70
第三节 淮南格物	99
第四节 学与政	124
第五节 结语：孝弟与师道	177
第2章 王襞：恪守家学传统	194
第一节 生平及家族	195
第二节 良知见成	202
第三节 乐即道也	206
第四节 小结	215
第3章 王栋：诚意慎独之学	219
第一节 生平及著述	219
第二节 反对“以知是知非为良知”	223

第三节 良知之上“不必加致”	227
第四节 良知本体，人人具足	231
第五节 从格物认取良知	237
第六节 意是心之主宰	247
第七节 小结	263
第4章 颜均：思想与实践的宗教趋向	268
第一节 前言	268
第二节 生命体验与乡村教育	271
第三节 “放心体仁”与“开心遂乐”	280
第四节 急救溺世的政治主张	285
第五节 小结	287
第5章 何心隐：乡村改良运动的实践家	290
第一节 前言	290
第二节 乡村改良运动	293
第三节 以“讲学”为生命	303
第四节 原学原讲	307
第五节 小结	310
第6章 罗汝芳：泰州学的终结	313
第一节 生平学履	313
第二节 仁学思想	324
第三节 孝弟慈	336
第四节 良知说	352
第五节 身心观	366
第六节 天心观	380
第七节 结语	405
结 论 关于泰州学派定位问题的几点探讨	425
征引文献	441
后记	454

绪论

泰州学案的重新厘定

引　　言

在 16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泰州学派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有不少学者认为晚明社会所出现的思想解放潮流与泰州学派有关，换种说法，泰州学派中的一些思想人物未免行为乖张、言论荒诞，与传统儒学之精神显得格格不入，这些思想及行为的异端因素成为打破传统、张扬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动源。也有学者认为该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号心斋，1483—1541）虽是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9）的弟子，然而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却是一个有别于阳明心学的独立学派。^① 关于泰州学派的归属问题，亦即泰州学派是阳明王门的一个流派，还是有别于阳明王门的一个独立学派，当今学术界尚有争议，此一争议涉及究竟应当如何判定泰州学派的思想性质等重要问题。目前，人们似乎默认这样一种处理方法：一方面承认心斋在思想上渊源于王阳明，另一方面把泰州学派视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

我的观点是，泰州学派属于阳明王门的一个流派，而且我们也不必过分拘泥于泰州学派的归属问题，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泰州学派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过程中，其思想上的传承关

^①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971～97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41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系往往是比较宽松的，而不具有严密的学术史意味，甚至可以说“泰州学派”之名称本身大有重新考察之余地。^① 确实，以往人们在对泰州学派进行思想研究之际，往往以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泰州学案”作为一种前提预设，以为“泰州学案”中所罗列的人物便不容置疑地等同于“泰州学派”。在我看来，“泰州学派”作为一种名称设置，用来指称心斋所开创的、经由王襞（号东崖，1511—1587）、王栋（号一庵，1503—1581）以及颜均（号山农，1504—1596）、何心隐（原名梁汝元，1517—1579）、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等人构成的学术团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泰州学派”之名称是可以成立的，若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则可说该派人物的思想各有特色，且对阳明心学都抱有一种认同意识，这一点同样不容怀疑。至于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判定泰州学派的思想性质，则应首先对泰州学派中各主要人物的思想作一番仔细深入的研究，这才是首要的工作。

然而在着手这一工作之前，却有一项前提性的工作需要去做，亦即对“泰州学案”作一番概念上的厘定工作。事实上，所谓“泰州学派”，通常是以黄宗羲所设定的“泰州学案”作为主要依据的。而泰州学案在《明儒学案》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共达5卷，即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六。不仅如此，而且该五卷泰州学案在整部《明儒学案》中可以称得上是最为奇特的“学案”。因为其中有两个问题令人感到困惑，也一直未得到妥善的解答：（1）为什么黄宗羲在六个“王门学案”之外，另设一个泰州学案，并省去了“王门”两字？是否有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那是因为黄宗羲已经觉察到泰州学派是“有别于王学的独立学派”的缘故，抑或另有原因？（2）泰州学案作为一个思想群体，其中所列入的那些思想人物是否果真都是泰州学派中人？显然，这两个问题与黄宗羲对阳明学的思潮发展以及明代思想的演变历史的总体把握有关。对此问题的解答，实际上

^① 参见张学智：《明代哲学史》，2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也就关系到我们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确切把握泰州学派的思想特质，同时也必然要重新审视“泰州学派”之所以成立的思想依据。

在总共 5 卷的泰州学案当中，有传且有语录可察者，共计 18 人。其中非泰州出生者占了绝大多数，尤以江西人居多。可以说，黄宗羲对泰州学案之设定，没有严格遵守以人物出生地以及以人物之间的师承关系为依据的设定原则，而是结合人物的思想类型来进行划分归类的。这一做法本身虽没有错，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比如，其中的赵贞吉（号大洲，1508—1576）、耿定向（号天台，1524—1596）、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这三系（各占 3 卷）的思想人物，就其各自的思想特征来看，是否应当被列入泰州学案？是否都是泰州学派中人？就很值得怀疑。关于“泰州学案”第 5 卷所列的周海门的学派归属问题，已有学者作了详细论考，结论是无论是从思想传承，还是从思想类型来看，周海门都应归入浙中王门的王畿（号龙溪，1498—1583）门下，而并非是近溪一系的泰州学派之传人。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见解，故而无须在此复述。^① 这里主要就赵大洲、耿天台与泰州学派的关系问题略作讨论，最后，对于李贽（号卓吾，1527—1602）与泰州学派的关系也将提出一些商榷性的意见，以此作为泰州学派之研究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首先，有必要从《明儒学案》的编撰方法以及体例安排说起。

一 泰州学案之设定

我们知道《明儒学案》主要有两个刻本：一是贾润刻本（简称贾本），二是郑性刻本（简称郑本）。两者分别完成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和乾隆四年（1739）。按照郑本的说法，贾本“杂以臆见，失黄子（即黄宗羲）著书本意。今续完万氏（指万言）之未刻”^②。万言刻本始于康熙三十年（1691），其时黄宗羲还在世，后来该本成

^① 参见彭国翔：《周海门的学派归属与〈明儒学案〉相关问题之检讨》，载《清华学报》（台北），新三十一卷第三期，2001（9）。

^② 《明儒学案》卷首，郑性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

了郑本的底本，不过当时仅完成了三分之一。至于郑性为什么说贾本“杂以臆见”，从而违背了黄宗羲的初衷？仅从上述这句话当中，难以了解此说的真实含义。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号谢山，1705—1755）对此有一个具体的说明：“故城贾氏颠倒《明儒学案》之次第，（郑性）正其误而重刊之”^①。这是说，贾本在排列次序上，对《明儒学案》做了手脚。这在郑性看来，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已经违背了黄宗羲著述该书的“本意”。

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排印本之底本乃是郑本。该本开卷是“崇仁学案”（即吴与弼，号康斋，1391—1469），其下依次是：白沙—河东—三原—姚江；贾本开卷则是“河东学案”（即薛瑄，号敬轩，1389—1464），其下依次是：三原—崇仁—白沙—姚江。撇开姚江学案不论，其实上述差异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套组合：崇仁—白沙与河东—三原。对于这两套组合，究竟安排何者为先，这就构成了郑本和贾本的最大差异。换言之，是将崇仁—白沙置于首位，还是将河东—三原置于首位，这关系到开明代学术风气之先究竟应当归属于何者的大问题。

那么，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原貌又是怎样的呢？就结论而言，郑本的安排（即以崇仁—白沙为开卷之首）是《明儒学案》的原来次序。这与黄宗羲对明代学术史的基本看法是吻合的。其基本看法可归纳为两点：（1）阳明学是明代学术思想的中心；（2）陈献章（号白沙，1428—1500）是宋明思想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总体来说，明代学术思想到了阳明那里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展。^②由于白沙之师乃是吴与弼，因此，把崇仁学案置于《明儒学案》之首，显然含有彰显陈、王一系心学的意味。由此可见，郑性说贾本有失黄宗羲著书之原意，是有相当道理的。同时也可看出，黄宗羲著书《明儒

^① 全祖望：《鮚埼亭文集选注》上篇《五岳游人穿中柱文》，135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

^② 黄宗羲指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序》，78页）

学案》，在各个学案的设计安排上，是下了一番苦心的，而不是毫无原则地随意安排的。进而我们也可以说，“泰州学案”的设计也一定有其内在的道理，反映了黄宗羲对阳明学派的基本看法。

然而，正如有的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关于《明儒学案》的结构安排问题，黄宗羲并没有具体说明^①，同样，有关泰州学案的设立，黄宗羲本人也并没有留下文字说明。因此，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可以想象的一个理由是，在王门学案之外，特意设立“泰州学案”，是因为在黄宗羲看来，其中的思想人物不能算是“正统”的阳明学派，故有必要作“另类”处理，将他们归类而另立学案。且不论黄宗羲的主观意图如何，就其实质性的意义而言，此举意味着他们被弃置于“王门学案”之外。就此而言，认为泰州学派本就是一个“假的阳明学派”^② 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笔者并不同意把泰州学派剔除在阳明学派之外，理由是：从师承关系看，心斋毕竟是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再从思想上看，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此外，黄宗羲对各学案的设计安排也可支持笔者的这一看法，比如在“白沙学案”之后，紧接着是“姚江学案”，却不是白沙弟子湛若水（号甘泉，1466—1560）的“甘泉学案”，在两者之间则是姚江学案至泰州学案的9个学案，这一设计安排意味着从姚江到泰州的9个学案在整体上必与阳明学派有关。据此，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泰州学案之设定并不意味着黄宗羲认为心斋在学术流派上与阳明心学完全无关。

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解释黄宗羲为何直称“泰州学案”而不像其他“王门学案”一样加上“王门”两字？^③ 由于他本人没有

① 关于《明儒学案》的版本以及刊行情况，参见山井涌：《〈明儒学案〉考辨》，《黄宗羲论——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48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② 参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971～972页。20多年后出版的《宋明理学史》下卷也坚持了同样的观点，认为泰州学派是“一个独立学派”（432页）。

③ 在姚江学案之后，依次为“浙中王门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南中王门学案”、“楚中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粤闽王门学案”，这些学案都被冠以“王门”两字。唯独后面的两个学案：“止修学案”和“泰州学案”，缺“王门”两字。就是这一点小小的差异，引起了后世学者的种种揣测。